

左翼文学发生语境下的 鲁迅批判吴稚晖问题

熊 权

内容提要 鲁迅何以“左倾”，原因多且复杂。在已有研究中，鲁迅对吴稚晖从认同到批判的变化，是一个尚未说得清楚、充分的问题，它影响并塑造了“左翼鲁迅”。本文从鲁迅批判吴稚晖说开去，考察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政府主义、三民主义、共产主义等多重思潮的交锋和对话，还原左翼文学发生时的历史语境。对照相关研究已成典范的“影响研究”思路，本文强调一个不同于单一主潮演化的“网状”左翼文学图景，它的突出特征是对话他者、多元竞发。

关键词 鲁迅；吴稚晖；国民革命；主义之争；左翼文学

“左转”作为鲁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，已经存在诸多理解和阐释。在鲁迅同时代，主要有以周作人、苏雪林为代表的“突变说”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“发展说”。前者评价鲁迅“左转”，或为老年人的胡闹，或受中共名利蛊惑，完全是讽刺、否定态度。后者运用“从进化论到阶级论”的思路，把鲁迅“左转”理解为一种符合历史发展的行为逻辑，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赞扬。后代的研究者则伸展为细致的历史、思想研究，如丸山升认为鲁迅转变基于对中国革命认知及判断的变化^①、张宁论述鲁迅的“转而不变”^②、邱焕星追溯鲁迅之变源自对“国民革命”的反思^③……

鲁迅“左转”前后，对吴稚晖进行批判是一段值得重视和追究的历史。鲁迅与吴稚晖都曾留学日本，又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明星人物。20年代中后期鲁迅逐渐“左倾”，被推崇为“左联”领袖。吴稚晖则积极支持蒋介石“清党”，沦为“被指挥刀指挥”的堕落文人，并成为主流历史中的“失踪者”。吴稚晖的“失踪”让鲁迅的相关评价已成定论，但进一步的追究不多。本文一方面追问尚未说得清楚、充分的鲁迅批判吴稚晖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尝试将这一问题植入中国现代思潮分化的历史文化图景。以国民政府“清党”为分水岭，五四新文化走向不可避免的分化，从主义之

争到“以理杀人”则构成了左翼文学发生的重要历史语境，“左翼鲁迅”深受这一语境的影响与塑造。

一 鲁迅批判吴稚晖的“公仇”“私怨”

同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，鲁迅与吴稚晖有交往也受其影响。很明显，鲁迅是从吴稚晖支持南京国民政府“清党”开始对他批判，此前态度如何却各有说法。有的认为那个时候的鲁迅对吴“非常尊重，甚至是仰慕的”^④，有的却认为并未“表现出多少崇敬之情”^⑤。实际上，鲁迅一度视吴稚晖为“同道”，虽不满其人其文却按捺不言；直到“清党”发生，他对吴彻底丧失认同感，先前埋藏的异见加上后来激发的愤懑一起爆发出来。细究鲁迅批判吴稚晖问题，尤其可见“五四”知识群体的分裂不为“私怨”，而是“公仇”。

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，吴稚晖因排满、激烈反传统而闻名。他原本走科考之路，后受甲午战败刺激、康梁变法影响，做了一名“维新派小卒”。1902年，赴日留学的吴稚晖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争执，愤而自杀未遂，最终被遣送回国。吴稚晖从此认定“立宪之不可成，皆知革命之不可已”，后来更卷入宣传反清而引发的“苏报案”，

加入以“驱逐鞑虏”为首义的同盟会。在文化立场上，吴稚晖属激烈的反传统派。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，他就提出“中国文字必废”的惊人之论。在20年代的“科玄论战”中，他发表《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倡言科学至上，抨击推崇主观、直觉的传统思维。差不多同时，他又批判梁启超、胡适等鼓动“整理国故”风潮，撰写《箴洋八股化之理学》，号召青年“不看中国书”，“要把国故和线装书丢在茅厕里三十年”。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吴稚晖的文学意义尤其得到彰显。他行文泼辣，不避俗字俗语，时时夹杂“放屁”等秽褻语。新文坛看重他追求文体解放的勃勃生气，又佩服那种敢对孔老二神位翻筋斗的魄力，誉之为“吴老爹之道统”^⑥。各种赞语也堆积到吴稚晖身上，周作人说：“他在《新世纪》上发表的妙文凡读过的人是谁也不会忘记的。”^⑦钱玄同说：“古今谈做文章的，我最佩服吴稚晖老先生啦。”^⑧曹聚仁认为吴稚晖不忌村俗粗话，“替白话文学开出最宽阔的门庭”^⑨。

无论“排满”还是反传统，鲁迅本是吴稚晖的同道。然而相较“五四”知识人普遍的借重推崇，他很少直接谈论吴，更没有出言称赞^⑩。这种“不参与”颇有意味。1927年以后，鲁迅有多篇文章批判吴稚晖，如斥之为“大观园的人才”“药渣”等，非常辛辣，这自然夹杂了对吴“清党”以来所作所为的愤怒。但他去世不久之前写的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涉及早年、晚年不同时期的吴稚晖印象，值得重视和细读。鲁迅忆及在日本初见吴稚晖，称他是登台演讲的“排满”先锋、又与驻日公使大战，颇有佩服的意思。然而笔锋一转，逐字记录吴稚晖的演讲：

但听下去，到得他说：“我在这里骂老太婆，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”，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，就感到没趣，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。“老太婆”者，指清朝的“西太后”。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，是眼前的事实无疑，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，我可不相信。^⑪

接下来一句作为收束和总结，则是更尖锐的批评：“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，但无聊的打诨，是非徒无益，而且有害的。”

指摘吴稚晖的演讲辞，隐含了鲁迅自己的文

章理想。按周作人说法，鲁迅偏好“用字的古雅和认真”。青年时代的鲁迅深受章太炎影响，相当重视遣词用字，这份认真到晚年不改。周作人又特别提到，初版《域外小说集》讲究文字“古雅”，后来的翻印本为配合白话文运动，才改得通俗许多^⑫。结合鲁迅自评初版《域外小说集》“佶屈聱牙”，可见他确有偏好“古雅”的初衷。鲁迅当然会自我调整以迎合新文学的通俗化趋势，但个人趣味积重难返，“古”要克制，“雅”不可尽弃。何况以俗为美特别需要小心把握，否则很容易滑入“肉麻当有趣”的境地。鲁迅批吴稚晖的演讲辞“无聊”，正是不屑他讲得痛快、失了尺度。当外界纷纷鼓吹吴稚晖是白话文代表，鲁迅对他的肯定格外谨慎：不在于文辞的滂沱，“只将所说所写，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”^⑬。吴稚晖的笔墨言辞，终究不是鲁迅心中的好文章。

鲁迅在“骂之为战”的层面上认可吴稚晖，内心却并不欣赏所谓“放屁文章”。在他看来，文字不妨戏谑俗化但必须有限度。了解鲁迅针对“油滑”的矛盾，也可以一探他对吴稚晖的真实态度。一方面，鲁迅觉得不该在写《不周山》时给女娲双腿间加上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，由此陷入了“油滑”；另一方面，写作《故事新编》的其它篇目还是不自禁地继续“油滑”，他为此自责多年以来并无长进^⑭。针对这种“自相矛盾”，研究者就艺术技巧、思想方法等诸方面做过精彩分析^⑮。其实，这也体现了个人趣味/反叛传统的不同路向。鲁迅在趣味上喜好“认真”“古雅”，但为了“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”^⑯，他看重俚俗、戏谑的破坏力。当然，俚俗也好戏谑也好，还是需要划定限度。鲁迅对“油滑”有所辩解：“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，不及对今人的诚敬，所以仍不免有油滑之处。”言下之意“油滑”并非滥用，实有解构历史的一番苦心。而吴稚晖“打诨”哗众取宠一俗到底，消解了认真/戏谑、雅/俗之间的张力，为鲁迅不喜。正如他又一次指摘吴稚晖的言辞：“（吴稚晖）说中国人‘起码要学狗’，倘是小学生的作文，是会遭先生的板子的，但大了几十年，新闻上就大登特登，还用方体字标题道：‘蹇然一老莅故都，吴稚晖妙语天下’。”^⑰

鲁迅不喜吴稚晖的文辞，对其人也殊无好感，后者则主要与章太炎相关。章太炎和吴稚晖在

“苏报案”之前就因学术观点、人事纠纷等多有龃龉，之后更为了吴稚晖是否出卖《苏报》同人一事发生激烈笔战¹⁸。作为章门弟子的钱玄同，曾表示深恶吴稚晖：“八九年前初读《新世纪》，恶其文章鄙俚，颇不要看，后又以其报主张用世界语及吴、章嫌隙之事，尤深恶之。”¹⁹还有更直接的态度：“前此因章师疑吴君为‘苏报案’之告密者，遂乃薄其为人。”²⁰这里提及吴、章冲突完全是维护老师的立场，至于斥吴稚晖“文章鄙俗”，正与鲁迅不满无聊的“打诨”接近。直到新文化运动中，钱玄同从复古转向疑古，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盛赞吴稚晖。晚年鲁迅对吴稚晖的评价，则呼应了钱玄同曾有的“深恶之”。鲁迅称赞章太炎最大的功绩是战斗的文字，与吴稚晖笔战则被列为重要战绩，他如此评价：

这笔战（指章太炎斥吴稚晖献策而引发的笔战——引者注）愈来愈凶，终至于夹着毒誓，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待时，还提起这件事，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，至今不忘，可见怨毒之深了。²¹

既然大赞章太炎有“所向披靡、令人神往”的战斗风范，吴稚晖的翻“旧账”、“怨毒之深”，尤其显得可恶。

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，鲁迅追忆章太炎提及吴稚晖，添加了“献策”二字作为定语²²。针对章太炎斥骂出卖《苏报》同人一事，吴稚晖数次辩驳。经反复自证以及当事人旁证，罪名得以澄清²³。连钱玄同都承认“告密之事，早经多人证明其无，则吴君之行自无可议”²⁴。然而，鲁迅依旧沿用章太炎之说。客观来看，鲁迅斥为“翻旧账”的《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》一文，当属吴稚晖对“苏报案”最有说服力的辩护。其中引用了蔡元培、章士钊两个亲历者和知情者的言辞。蔡元培直言章太炎《邹容传》中提到告密是“想当然语”，章士钊则说明革命党人与处理“苏报案”的清廷大员俞明震早有交道，是俞故意放走包括自己在内的《苏报》一干人。鲁迅却搁置文章的辩诬意义，只强调吴稚晖积怨不忘旧事，满满都是对“吾师太炎先生”的维护。不能不说，吴稚晖一生可批评处固然很多，“献策”却实在莫须有。

探讨鲁迅评价章吴公案，主要说明即使“清党”之前，鲁迅也绝不可能仰慕吴稚晖。值得强

调的是，鲁迅把个人态度与社会批评区别得很开，他说自己的杂感文“实为公仇，绝非私怨”，并不虚言。对于吴稚晖，鲁迅即使早因个人趣味、私人情感萌生“私怨”，但考虑到新文化阵线联合的大局还是选择了能容则忍。直到吴杀人称快制造“公仇”，他才终于公开批判。

二 主义之争时代的吴稚晖逆行溯因

吴稚晖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积累了很高声誉，却因支持国民政府“清党”走向拐点。不仅鲁迅批判，众多“五四”同人也纷纷表示不齿。由于吴稚晖顽固反共，所作所为基本被归结为醉心权力、丧心病狂。然而，如果返回各种思潮交锋、对话的历史语境，吴氏逆行将获得丰富、深入一些的解读，更有助于了解鲁迅批判吴稚晖的关键落在“以理杀人”。

吴稚晖是著名国民党元老，先后辅佐孙中山、蒋介石、蒋经国三代领导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，即中国最早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。1907年6月，吴稚晖与李石曾在巴黎创办《新世纪》，这份杂志与刘师培何震夫妇在日本东京创办《天义》差不多同时问世，被视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头。吴稚晖自己也宣称：“把我吴稚晖烧成了灰，也是一个国民党党员，我同时又是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者。”²⁵在他的思想意识中，无政府主义、三民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关联与区别究竟是什么？

吴稚晖“反共”涉及各种复杂因素²⁶，也自有一套思想层面的逻辑。概言之，他秉信无政府主义的“互助”、“合作”观，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。早在1905年，吴稚晖面见孙中山而同情反清，但主要接受“反清”作为手段，至于革命之后的“理想国”并不服从美式民主共和制。无政府主义设计的人人平等、无国家政府约束的乌托邦长期占据了他的头脑。吴稚晖流亡法国之际，正值当地无政府主义思想活跃，他不仅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和报刊，也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往来互动。可见一斑的是，吴稚晖和李石曾深受邵可侣、格拉弗等影响，创办刊物甚至沿用了他们的法文杂志“新世纪”之名。吴稚晖还曾亲往欧洲无政府主义实验营地“鹰山村殖民地”参观，

对那里人人平等、无外在制度约束的集体生活留下深刻印象。他认为鹰山村按无政府主义设想而建，却深刻契合着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社会、桃花源理想。

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对无政府主义报莫大的热情，吴稚晖只是其中一员。被“迷”住的众多知识分子中，甚至包括日后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、丁玲、张闻天、陈延年、赵世炎……如果追问无政府主义魅力何在，克鲁泡特金的“互助论”纠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“天演论”，是重要原因之一^②。自严复译著《天演论》呼喊“弱肉强食，优胜劣汰”，不仅警醒国人看见自身闭塞落后，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“丛林法则”不仅彻底悖逆传统性善、仁爱论，而且逼迫弱小者承认必将遭遇被淘汰的命运。国人不能甘心束手待毙，却也无法认同历史之恶：“人虽是个动物，一定要说与虎豹豺狼同类，只知道生存，不知道善恶是非，这句话如何叫人承认得下去？”^③相比较之下，“互助论”重文明轻兽性，强调生物进化有赖相互合作关系，显然更照顾受众心理。更有说服力的是，“互助论”不靠占据道德高点煽情，而以客观科学来立论。克鲁泡特金通过考察动物界、原始人群、中世纪以及现代的人类生活，实证“互助是一种生物的本能，互助法则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进化法则”，大大迎合了“五四”科学主义潮流，令吴稚晖等追随者心悦诚服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突破“弱肉强食”准则、提供一种与“生存竞争”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，是无政府主义最契合并鼓舞中国弱小民族心理之处。

克鲁泡特金的不少作品在《新世纪》杂志上被翻译、连载，吴稚晖对“互助论”心领神会。他批评国人理解“进化论”没有看到“互助”的一面：

然汉译所谓竞争，尤未足以尽西文之原义。西文 Concurrence（竞争——引者注）之原义，实即“共同发脚”之谓……至于万物共同于世界，各向优点，此各行其是，更无竞争之可言。虽竞争之解说，华字亦含勤勉之义，不必尽属诈斗；惟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以词害志，译事不可不慎。依同人之意，必当译做‘共同’，则胜败之恶名词，亦当

弃去。^④

他甚至认为“互助”比“竞争”更重要：“人谓世界是无竞争则无进步，吾更言曰：无互助则更无进步，所以赖生存而有进步者，在互助而不在竞争。”^⑤基于力排“竞争”，吴稚晖反马克思主义尤反“阶级斗争”。在他的理解中，马克思鼓励人群内部互相夺取，虽改变社会分配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穷，反而大大激发人性恶。针对中国社会现实，吴稚晖更具体地批判：

欲求中国经济之平等，断不能鼓吹阶级仇视，而必须劳资合作。欲求中国政治之平等，断不能鼓吹农工专政，而必须全民联合。欲求中国国际之平等，断不能妄称国际主义，而必须民族主义为基础。……乃共产党极力鼓吹阶级仇视，致工商各业破坏净尽。极力鼓吹农工专政，致流氓土痞横行无忌。极力鼓吹世界革命，致国民革命大受打击。^⑥

上述“劳资合作”“全民联合”等措辞固然专门针对阶级斗争、农工专政，却分明留下“互助论”的烙印。

在吴稚晖看来，三民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不少相通相融之处，这是二者联合的基础。首先，三民主义之父孙中山相当重视“互助论”，他的《建国方略》明确主张“物种以竞争为原则，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。社会国家，互助之体也，道德仁义者，互助之用也”^⑦。其次，吴稚晖最看重三民主义的“民生”一项，也脱不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底子。民生主义主张把整个民族、人群联合起来，来追求大力发展物质经济、追求温饱富足，在方式和目标上，正与无政府主义以互助协作求发展、以自由和谐求生存不谋而合。

援引三民主义修正无政府主义，吴稚晖思想为之一变。他1908年发表《无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》，提出与党派联合的必要。相对那些理想化的、认为乌托邦可以一蹴而就者，吴稚晖强调“凡新旧主义之相代，期间必有过渡之一物”。为促成理想“落地”，他认定三民主义是通向无政府主义的“过渡”：

纵阶级斗争之狭隘行动，而造一时之突变，却不合进化之正常。进化之正常，则既入社会民政时代，当以三民主义为今后人类社会自治若干世纪之一阶段。由三民主义，

蜕入真共产，以至于大同；人类实受渐变之福，不受突变之殃——不必受之殃。^③

一战结束后，眼见各帝国主义分赃相争并历经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挫折，吴稚晖更确认无政府主义短时间内无望：“三民主义三十年成功，共产主义三百年成功，无政府主义三千年成功。”^④据历史学家考究，吴稚晖等之所以下决心推动“清党”，最直接的刺激就是听到陈独秀宣称“二十年内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”^⑤。如此飞跃、突进式革命，完全打破了渐变进化论、循序革命观，令他们深深忧惧。

吴稚晖欲借助国民党施行教育、修德等渐进法改造中国。为“清党”效力后，他还干劲十足地办劳动大学，宣称要“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”。然而，他的主义已经蜕变。胡适嘲讽如此这般无异“脚踏两船”：“然今日之劳动大学果成为无政府党的中心，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，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，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，还有更甚于此的吗？”^⑥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看来，吴稚晖更是有违初衷。顾名思义，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制度和机构，主张人按照互助、契约原则毫无约束地自由生活，特别反感任何的权威以及组织。眼见吴稚晖、李石曾等与国民党合谋，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华林谴责：“李、吴两先生与贵党（指国民党——引者注）发生关系之时，即不啻与无政府党宣布脱离关系。……将两不相容之主义而强和之，岂非宣布李、吴人格破产乎。”^⑦另一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也痛骂吴稚晖言行不符，要求他退出无政府者创办的进德会^⑧。

可以看到，是否与政党合作成了2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分歧的关节点。且不论吴稚晖被斥“人格破产”，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巴金仅仅提议无政府主义应当参与国民革命，也被视为与政党合流的“叛徒”^⑨。无政府主义的内部分歧，折射出随国民革命的发动与扩张，一个“多党竞革”时代的来临。无政府“正统派”还在苦苦支撑不与任何党派合作，但众多现代政党的陆续成立和发力，让经受过个性主义洗礼的“五四”知识人必然面临一个新问题——如何处理自身与政党组织的关系。借用有的研究者的描述：“五四”培养的知识精英们“在‘党化’与‘化党’的事实推演中，逐步找到了一条改造政党、

变革中国的有效途径。”^⑩

在无政府主义分化之外，彼时更多的主义之争落在选择、偏向何种政党之上。随着国民党、青年党、共产党各自壮大，鼎足之势渐成，各党无论在政治组织还是思想言论方面都竞相角逐、一较高下。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，吴稚晖的“偏向”算是一种常态。曾经崇敬他的陈延年、赵世炎，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痛感经济欺压，由无政府主义转而追随共产主义，他们参与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。曾是少年中国会骨干的曾琦、李璜，一度热衷“工读互助”、追随无政府主义，因惊叹德国崛起之迅速，转而强调凝聚一国族之力量与精神的国家主义，在巴黎悄然组建青年党。新兴政党的涌现和崛起，改变了民初以来革命由国民党一党独导的局势，也令主义之言盈天下。“五四”新知识群体不同程度地受到主义之争影响，并在各种主义的对话、交锋中寻找自身位置。

三 反思“以理杀人”与鲁迅“左倾”

吴稚晖倡“互助”反“天演”，亲三民主义远马克思主义自有一套学理逻辑，在众声喧嚣中维护自家主义也无可厚非。然而，主义之争发生在思想文化层面有利于真理越辩越明，一旦与权力结合就变得异常狰狞。吴稚晖借政权强推主义，从新文化先锋急速降落为“以理杀人”的刽子手。鲁迅可以容忍文章趣味、私人交往等方面的“私怨”，却不能坐视主义与权力合谋杀人的“公仇”。“左翼鲁迅”的基本出发点，就是批判吴稚晖式施暴，义无反顾地站到被镇压被残害者一边。相较鲁迅，胡适、周作人反思“以理杀人”的侧重点各有不同，新文化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。

吴稚晖在国民政府的“清党”中发挥了重要效用，作为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，他不仅最早提出纠察共产党“谋叛”，还亲自草拟《吴敬恒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》，又与一众反共右派联名发表“护党救国”通电，竭力为“清党”制造舆论。尽管蒋氏“清党”事实上“开创了现代史上、甚至多半也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新生政权结合群众检举的办法，用武力在全国范围残酷清除异己的先例”^⑪，吴稚晖等却以“共图匡济”“扶难定倾”一类的言论为之披挂堂皇外衣。

为此，他获得蒋介石盖棺定论的表彰：“首主清党，扫荡奸邪。为国民革命之导师、实反共抗俄之先党。”^②

“清党”从江浙迅速蔓延到广东。鲁迅身处革命策源地，自言经历了“从来没有经历过”的恐怖，“被血吓得目瞪口呆”^③。广州“清党”起始于4月15日凌晨，先是全城紧急戒严，实施突然抓捕，共计逮捕2100余人，以工人占多数，其次是学生。黄埔军校成了清查重点，按名单逮捕了近500人。鲁迅担任教务长的中山大学，则有40多个学生被捕。接下来的数日间，许多共产党人陆续被杀。颇触动鲁迅的是一直往来较多的共产党人毕磊之死。鲁迅初来广州，毕磊为之引见陈延年。他逮捕后很快被秘密枪毙，鲁迅起先疑惑“常常来谈天的，而今不来了”，了解事态严峻之后，才忍不住叹息：“据我的推测，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，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。”^④

随着运动扩张，鲁迅自认与政党无干也难逃监控和侦查。他的往来信件遭检查，又顶着“激进”“亲共”的嫌疑不敢冒然离穗，期间时时目睹捕人、杀戮的残酷与任意。例如弄得风声鹤唳、人人自危的“瓜蔓抄”：“常听到因为捕甲，从甲这里看到乙的信，于是捕乙，有从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连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”^⑤又有毫无道理却杀伤力极大的“可恶罪”：“要说他是CP或CY，没有证据，则可以指为‘亲共派’。那么，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‘反革命’，有罪。再不得已，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，诉诸法律了。”^⑥

吴稚晖与国民党合谋细节一时不被外界确知，他对屠杀的冷漠甚至叫好却足以激发众怒。鉴于“清党”扩张造成惨剧，曾是主要推动者之一的蔡元培转而反思，劝谏当局加以收束。吴稚晖不仅不为所动，还出言嘲讽被杀者“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，都是叩头乞命，毕瑟可怜”^⑦。他公然为陈延年被杀喝彩，尤其令人齿冷。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，在江浙“清党”中牺牲时年仅29岁。他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，因拒绝下跪就刑被乱刀砍死，而且暴尸不许收敛，场面异常惨烈。吴稚晖与陈独秀原是旧交，与陈延年也早已相识，还出力帮助他赴法留学。那个时候，追随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以及众多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尊吴稚

晖为导师、圣人，与之多有交道。后来，勤工俭学学生群体与吴主持的华法教育会发生经济纠纷，又发动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，逐渐成长成熟，其中一部分人受共产主义吸引。陈延年更成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、宣传部长，在思想上与吴稚晖彻底分道扬镳。

吴稚晖听闻“主义之敌”陈延年被捕大喜，他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，一边恭贺他抓获逆党奸恶，一边恭维他“先生真天人”。虽然陈延年的生死未必能由吴稚晖定夺，但信中提及这位故人之子、昔日小友，有咬牙切齿之状，可见怂恿杀人之心：

恃智肆恶，过于其父百倍。所有今日之共产党之巨头，若李立三，若蔡鹤孙，若罗亦农，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。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，恐与其父相埒……尤属恶中之恶！……故此人审判已定，必当宣布罪状，明正典刑。^⑧

陈延年死后，吴稚晖往来信件被《申报》刊登，读者哗然。与吴稚晖相识相交的新文化人最是心惊，他们和这位“中国稀有的文学天才”一起经历“个人的发现”，转眼见他恭维屠夫、杀人称快。这不仅仅是主义之争，而已经触犯现代人的良知底线。

吴稚晖在新文化界形象跌落，各种批评之声涌来：“吴先生我是素来所拜服的，但最近一年来的行径与前大不相同。如关于陈延年被杀后的所云……大大的损其人格，我深替他可惜。”^⑨“（吴稚晖）言行相违，成为社会革命的叛徒，太使我们失望了！”^⑩一片唏嘘当中，胡适尤其震惊。陈延年被捕之初辗转求救，胡适得讯后托付吴稚晖，岂料吴不施援手反而落井下石，胡适不能释然。他写信给吴稚晖，特意提及陈延年案，先说理解吴支持“清党”是看不得共产分子投机，但接着一句“便可以养成‘以理杀人’的冷酷风气而有余……”^⑪，分明谴责吴稚晖凶狠。相比胡适绵里藏针，周作人就说得直接了：“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，还要摇动他的毒舌，侮辱死者，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。”^⑫他还把“清党”比喻为文字狱的故鬼重来，一针见血地指出“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”，所谓“护党救国”不过恐怖的“以思想杀人”^⑬。

鲁迅与胡适、周作人的不同，在于亲历广州“清党”的血腥恐怖，所以尤其愤怒悲哀。他抨击吴稚晖直呼其名：“吴稚晖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？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，且可以大呼‘打倒……严办’者。”⁵⁴鲁迅向来擅长从具相归结类型，又从类型直达本质，假如只面对个体的吴稚晖不至于格外激愤。令他格外失望的是，发现权力居然如此有效：“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可以指挥武士，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。”⁵⁵身为“五四”偶像者居然依仗强权践踏人命，真极大嘲讽了高倡独立人格、批判精神的新文化运动。

在鲁迅这里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变，那就是透过吴稚晖对眼前的国民革命发生了新认识。他认清了所谓“革命文学”“革命文学家”不过貌似公允、恃强凌弱：

从指挥刀下骂出去，从裁判席上骂下去，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，真是伟哉一世之雄，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……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，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。⁵⁶

鲁迅也认清了吴稚晖背后政权的强横，国民政府借“革命”之名行清洗之实，令“革命”变成了“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……”的循环杀戮。增田涉曾记录鲁迅表示非常憎恶国民党的一段话：

旧式军阀为人还老实点，他们一开始就不容共产党，始终坚守他们的主义。他们的主义是不招人喜欢的，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、反抗它就行了。而国民党所采取的办法简直是欺骗；杀人的方法更加狠毒。……打那以来，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，我怎么也感到厌恶，总是觉得可恨。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。⁵⁷

日本学者丸山升曾强调中国革命的具体境遇对鲁迅的激发和改造，颇有启发性。他以为鲁迅“左转”，并不意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、或者从非革命到革命的变化，而是对中国革命、变革的承担者和实现过程的认识发生了变化⁵⁸。的确，相比北洋军阀，鲁迅一度寄希望于国民政府。段祺瑞政府最令新文化人失望的，莫过于制造屠杀民众和学生的“三·一八”惨案。这个“民国最黑暗的一天”引发了京城知识人的集体南下风潮，鲁

迅也正是此后不久离京另觅生路。国民政府一手炮制的“清党”，又一次在鲁迅内心激发风暴——这个以“革命”为号召的政权原来一样杀人、一样“革”人之命。鲁迅向来视生命为第一要义，主张“在尊重生命的根本之上，去发现一切人生工作的意义”⁵⁹。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，他迅速倾向了遭到清洗镇压的共产党一方，对后来遭遇查禁的“无产阶级文学”也报以同情。就像《二心集·序言》所说：“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，毫不可惜它的毁灭。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，以为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，却是的确的。”当然，鲁迅差不多同时也说过“革命无止境”⁶⁰，世上没有什么止于至善，他对“中国革命、变革的承担者和实现过程的认识”还将随现实状况发生变化。但就当时的鲁迅而言，反抗、批判一个杀人的政府却是毫无疑问。

是否反思以及如何反思杀人，曾经的“五四”同人各持己见。吴稚晖一意拥护政府杀人，站到了与鲁迅截然的对立面。他与大多数新文化人的区别在于，认为“杀人”不是底限只是手段。对于胡适指责处理陈延年案冷酷残忍，他以退为进：“到了二十世纪，还得仗杀人放火，烧杀出一个人类世界来，那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呢？……所以我是狂易了，也破产了，怂恿杀朋友，开口骂朋友，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罢了，还敢在先生面前忏悔么？……马格斯煽出来那班恶魔，是会归天的。”⁶¹这是自嘲，又何尝不是自辩！吴稚晖口头上的“不敢忏悔”，行动上的不忏悔，因所谓“烧杀出一个人类世界”，显得理直气壮。在胡适方面，虽然对国民政府有所不满，但终究以承认它的合法性为前提。基于观察吴稚晖一类“政要”的所作所为，他选择与之保持距离，以“诤友”身份走参政议政之道。而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不履险境，远观南方政府辖下的杀人之祸，他一边痛感吴稚晖身上潜伏着永乐、乾隆的鬼，一边自觉对“党化”时代无力。与其对政治指手画脚，不如求自我的启蒙和修养，周作人走向“自己的园地”。

余论

鲁迅批判吴稚晖，反映了“后五四”时期新

文化内部的分化。随着国民革命的展开,曾为“同道”的新文化人遭遇各种后起、具有党化意味的主义的冲击,渐行渐远分道扬镳。鲁迅“左倾”、吴稚晖政客化、胡适做政府的“诤友”、周作人向往“自己的园地”……都是置身主义之争时代而呈现的倾向。

从上述思路讨论“左翼鲁迅”的生成,则得以窥见左翼文学发生的复杂历史语境。在相关研究领域,“影响研究”堪称经典范式,研究者细致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、接受,主要把中国左翼文学视作外来思潮影响的产物^①。此类学术论著以扎实的资料梳理、放眼世界的视野,大大启发并开拓了已有研究。然而,一种学术思路带来极大创造性的同时,也留下其他推进空间。“影响研究”在单一主潮演化的框架内描绘左翼文学图景,远远不能说尽其发生发展。中国近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“左倾”往往来自具体境遇激发,有的甚至还追随过它种“主义”;而曾经追随、同情马克思主义,却转向它种“主义”者也不在少数。例如“以理杀人”的历史语境是鲁迅“左倾”的直接推动力;吴稚晖鼓吹“清党”前,一度对共产革命有同情之心、合作之意;被他视为“主义之敌”的中共江苏党首陈延年,最早追随的则是无政府主义……这样的细节和层次,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叙述中或语焉不详,或讳莫如深。在远去刀光剑影的当下时代,不妨以兼容思维替代斗争思维,去发掘不一样的文学史图景——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多元线索竞发。它们之间或有主次大小之分,但体现为丰富交迭的层次;它们之间或有分歧冲突,同时展开互动对话。本文探究鲁迅批判吴稚晖问题、还原鲁迅左转的历史语境,意在发掘那些围绕马克思主义、与之交锋对话的“次线索”(无政府主义、三民主义)。这是对“网状”左翼文学图景的“考古”尝试,也是提醒“另一种”文学史的可能。

[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左翼文学内部的多重革命话语研究”(16BZW131)阶段性成果]

①参见[日]丸山升著:《鲁迅·革命·历史——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》,王俊文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②参见张宁:《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:鲁迅与左翼》,复旦

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

③参见邱焕星:《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》,博士学位论文,南京大学中文系,2011年。

④邱焕星:《鲁迅1927年的“国民革命文学”否定论》,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12年第2期。

⑤张全之:《吴稚晖与〈新青年〉》,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16年第6期。

⑥参见袁一丹:《“吴老爹之道统”——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与思想资源》,《中国现代研究丛刊》2017年第2期。

⑦周作人编选: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》,“导言”第12页,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。

⑧钱玄同:《废话的废话》,《疑古玄同:钱玄同随笔》,第108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

⑨曹聚仁:《一个刘姥姥的话》,《文坛五十年》,第13页,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。

⑩据统计,《鲁迅全集》提及吴稚晖有20余处,绝大部分是在1927年之后的杂文中。此前,除提到某些具体交往外,所言极少。参见孙海军:《鲁迅笔下吴稚晖形象之变迁及缘由》,“2016年鲁迅文化论坛”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。

⑪⑫鲁迅: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,《鲁迅全集》(6),第578页,第578页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其它均出自此版本,不另注。

⑬周作人:《鲁迅的国学与西学》,《周作人自编文集·鲁迅的青年时代》,止庵校订,第44页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其它出自此版本,不另注。

⑭鲁迅:《古书与白话》,《鲁迅全集》(3),第228页。

⑮参见鲁迅:《故事新编·序言》,《鲁迅全集》(2)。

⑯代表研究如王瑶《〈故事新编〉散论》(《王瑶全集》(6),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)、刘玉凯《“油滑”的定位——鲁迅〈故事新编〉艺术新论》(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8年第4期)、郑家建《“油滑”新解——〈故事新编〉新论之一》(《鲁迅研究月刊》1997年第1期)等。

⑰鲁迅1935年1月4日致萧军、萧红信,《鲁迅全集》(13),第330页。

⑱鲁迅:《六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二卖》,《鲁迅全集》(6),第414页。

⑲参见杨涛:《章太炎与吴稚晖交恶始末》,《文史杂志》2005年第4期。

⑳1916年9月19日钱玄同日记,杨天石主编:《钱玄同日记》(上),第291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年。

㉑1917年1月11日钱玄同日记,杨天石主编:《钱玄同日记》(上),第300页,第300页。

㉒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中“××的×××”,据《鲁迅全集》注释当为“献策的吴稚晖”,《鲁迅全集》

- (6), 第569页。
- ②③可参考唐振常:《苏报案中一公案——吴稚晖献策辩》,《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》1986年第3期。
- ②④⑤吴稚晖:《致华林书——无政府党人进国民党的理由》,《吴稚晖全集》(8),第468页,第468页,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。其它出自此版本,不另注。
- ②⑥可参考陈清茹:《试析吴稚晖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》,《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》2015年第6期。
- ②⑦可参考吴浪波:《互助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》,《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。
- ②⑧乙:《内外时报:终了的老世纪与德国学者》,《东方杂志》1919年第4期。
- ②⑨吴稚晖:《书自由营业管见后》,《吴稚晖全集》(1),第182页。
- ③⑩无政府主义分子(吴稚晖):《答问疑君》,1908年1月21日《新世纪》第36号。
- ③⑪吴稚晖:《三以忠告之言警告汪精卫书——党国存亡的关系》,《吴稚晖全集》(7),第352页。
- ③⑫孙中山:《建国方略》,《孙中山全集》(6),第195—196页,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- ③⑬吴稚晖:《精神物质应当并重说》,《吴稚晖全集》(1),第218页。
- ③⑭袁振英:《袁振英的回忆》,载高军、王桢林、杨树标主编: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》,第539页,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
- ③⑮杨天石:《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——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3年第6期。
- ③⑯1927年10月24日胡适致蔡元培,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21页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。其它出自此版本,不另注。
- ③⑰参见刘师复:《师复文存》,第141页、131页,革新书局1928年版。
- ③⑱参见巴金:《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》、《答诬我者书》,《巴金全集》(18)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。
- ④⑰周良书:《“五四”精英与近代中国政党政治》,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2年第1期。
- ④⑱杨奎松:《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“清党”运动研究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5年第6期。
- ④⑲杨恺龄编:《吴稚晖先生纪念集》,第86页,(台湾)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。
- ④⑳鲁迅:《三闲集·序言》,《鲁迅全集》(4),第4页。
- ④㉑鲁迅:《怎么写——夜记之一》,《鲁迅全集》(4),第21页。
- ④㉒鲁迅:《两地书·序言》,《鲁迅全集》(11),第3页。
- ④㉓鲁迅:《可恶罪》,《鲁迅全集》(3),第516页。
- ④㉔④㉕周作人:《偶感(四)》,《周作人自编文集·谈虎集》,第182页,第182页。
- ④㉖1929年3月13日《胡适日记》附吴稚晖致杨虎信原文,曹伯言整理:《胡适日记全编·5》,第364页,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。
- ④㉗1928年8月23日高君珊致胡适,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53页。
- ④㉘曹聚仁:《我与我的世界》,第315页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。
- ④㉙1928年3月6日胡适致吴稚晖,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38页。
- ④㉚周作人:《谈虎集·后记》,《周作人自编文集》,第394页。
- ④㉛鲁迅:《答有恒先生》,《鲁迅全集》(3),第477页。
- ④㉜鲁迅:《小杂感》,《鲁迅全集》(3),第554页。
- ④㉝鲁迅:《革命文学》,《鲁迅全集》(3),第567页。
- ④㉞[日]增田涉:《鲁迅传》,卞立强译,《鲁迅研究资料》(2),第391页,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。
- ④㉟[日]丸山升:《“革命文学论战”中的鲁迅》,王俊文译,《鲁迅·革命·历史——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》,第42页。
- ⑤⑰[日]增田涉:《鲁迅为什么主张人的生存和温饱》,《鲁迅的印象》,钟敬文译,第63页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0年。
- ⑤⑱鲁迅:《黄花节的杂感》,《鲁迅全集》(3),第428页。
- ⑤⑲1928年3月4日吴稚晖致胡适,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第336—337页。
- ⑤⑳艾晓明《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)、李今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)等,为此类研究代表作。

[作者单位:河北大学文学院、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]
责任编辑:萨支山